全球对话 6.4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4期，以17种语言刊出

社会学、权力、政治

Anthony Giddens

希腊的经济困境

Vassilis Fouskas,
Maria Markantonatou,
John Milios,
Spyros Sakellaropoulos,
Stratos Georgoulas

拉丁美洲 堕胎权的抗争

Julia McReynolds-Pérez,
Susana Lerner, Lucía Melgar,
Agnès Guillaume,
Erika Busse

阿拉伯的社会科学

Mohammed Bamyeh,
Seteney Shami,
Idriss Jebari

特辑

> George Ritzer谈麦当劳化和生产消费
> 与全球社会学超过40年的关系
> 介绍日本编辑团队

MAGAZINE

GD 第6卷 / 第4期 /2016.12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主编的话

回首过去，放眼未来

我们这期继续回首过去，放眼未来。我们回顾了《全球对话》过去的六年发生的大事，从社会运动如Indignados、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到其他的右派运动像是埃及、土耳其、波兰、匈牙利、菲律宾、阿根廷、巴西等的威权政府。这个全球趋势可以部份归因于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吸取的国家的自主性而扩张，导致了左派和右派的民粹浪潮，并且右派民粹仍持续升高之中。

我想我们从 Anthony Giddens 的访谈开始是再好不过的了。Giddens 是理论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曾经称全球化是非常有威力的。Giddens 是英国上议院的荣誉议员，并且继续支持他所关心的问题，像是气候变迁以及在数字时代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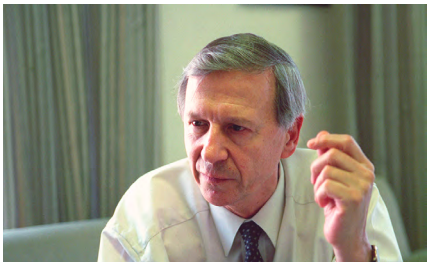
全球化的黑暗面则可以在 SYRIZA 的命运中看到，这个运动几乎让欧盟臣服，但是最后臣服的是希腊。我们刊登了五篇文章讨论由欧盟施加于希腊的撙节政策如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把贫穷带给了希腊，却让那些上层阶级更富有。

在拉丁美洲，超过时的社会民主经验，也是所谓的粉红潮流，最后却导致了国家的纷纷右转。我们有三篇文章讨论关于女性堕胎权利的议题。创意的抗议在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引起了不小的波浪。特别有趣的是如何使用同样的药物去避免或是中止怀孕。

关于阿拉伯社会科学，我们刊登了三篇文章讨论。第一篇文章是由 Mohammed Bamyeh 所写的关于该学科于阿拉伯世界的状况。第二篇是 Seteney Shami 对于社会科学下层基础的重要性的强调。第三篇是 Idriss Jebari 从批判的角度去讨论阿拉伯之春与相关论述，认为该运动为阿拉伯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

我们刊载了知名社会学家 George Ritzer 的访谈节录，由年轻的科索沃社会学家 Labinot Kunushevci。Edward Tiryakian 则提供了他从 1974 年与 ISA 的过往历史。最后介绍了 Satomi Yamamoto 所带领的日本翻译团队。我也很高兴跟大家介绍我们第十七个语言的版本：孟加拉国，是由位于 Dhaka 的 Habibul Khondker 所带领的。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Anthony Giddens是知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也是上议员荣誉议员。其讨论社会学在政治中的挑战。

希腊的经济困境。本期有五篇文章讨论欧盟对希腊的高度管制和如何失败。

拉丁美洲的堕胎权。本期有三篇文章讨论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的抗争。

GD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Gay Seidman.

副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Eashrat Jahan Eyemoon.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arjan Namaz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taro Shimokawa, Shinsha Kameo, Mizuki Ichikawa, Hayato Ishihara, Hiroki Kawabata, Hiromi Murakami, Kenta Kajitani, Kento Kusudo, Hirotaka Tanaka, Chiye Yamada.

哈萨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Adrianna Drozdro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ą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Corina Brăgaru, Nicoleta-Mădălina Ailincăi, Costinel Anuța, Adriana Bondor, Alexandra Ciocănel, Tatiana Cojocari, Andrei Dobre, Iulian Gabor, Ștefania Cristina Ghiocanu, Alexandra Isbășoiu, Rodica Liseanu, Mădălina Manea, Anca Mihai,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ş-Mihai Muş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Ion Daniel Popa, Ioana Silistraru, Eliza Soare, Adriana Sohodoleanu, Diana Tihan, Elena Tudor, Carmen Voinea,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编辑顾问: Gustavo Taniguti.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回首过去，放眼未来 2

社会学、权力、政治：访谈Anthony Giddens
Peter Kolarz,英国 4

> 希腊的经济困境

希腊：地缘政治和破产的历史
Vassilis K. Fouskas, 英国 7

希腊的国家撙节政策
Maria Markantonatou, 希腊 10

SYRIZA：从颠覆到实用主义
John Milios, 希臘 12

希腊金融危机的赢家和输家
Spyros Sakellaropoulos, 希腊 15

希腊纾困是国家和企业的联合犯罪
Stratos Georgoulas, 希腊 17

> 拉丁美洲对堕胎权的抗争争

米索前列醇时代的阿根廷堕胎权运动
Julia McReynolds-Pérez, 美国 19

墨西哥对堕胎权的翻转
Susana Lerner,墨西哥, Lucía Melgar,
墨西哥, Agnès Guillaume, 法国 22

堕胎作为暴力：秘鲁的斗争
Erika Busse, 秘鲁 24

> 阿拉伯的社会科学

简介阿拉伯社会科学
Mohammed A. Bamyeh, 美国 26

阿拉伯世界新社会科学的下层基础
Seteney Shami, 黎巴嫩 28

阿拉伯社会科学：阿拉伯之春的前后
Idriss Jebari, 黎巴嫩 31

> 特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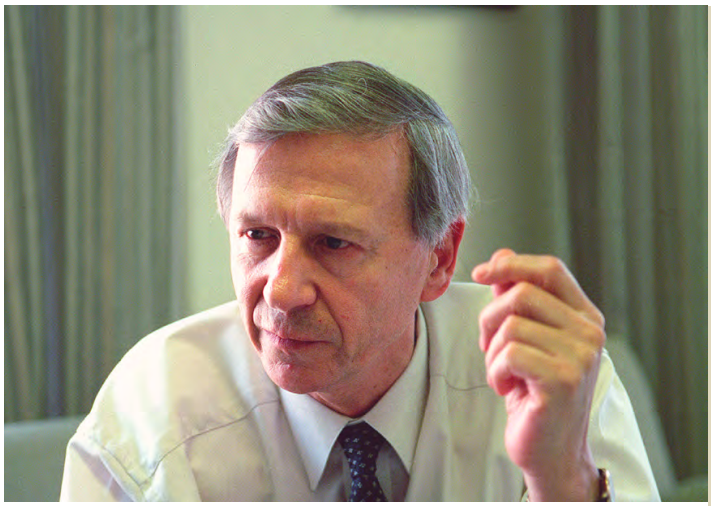
麦当劳化和生产消费：访谈George Ritzer
Labinot Kunushevci, 科索沃 34

与全球社会学超过40年的关系
Edward A. Tiryakian, 美国 36

《全球对话》的日本翻译 38

> 社会学，政治，权力

访谈Anthony Giddens



Anthony Giddens.

Anthony Giddens 在 1970 年代是英国社会学的的指标人物，他首先带领了重新诠释古典社会学的当代风潮。他剖析了结构中的能动，并连结巨观和微观，以及全球化下的日常生活。最近他则处理了科技革命的后果和气候变迁对人类所带来的影响。他写了超过 30 本书，并且是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的前院长和荣誉退休教授。他也是 2004 年被选为英国上议院的荣誉院士。本篇访谈聚焦在社会学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Peter Kolarz 是英国 University of Sussex 的社会学博士，他是 Technopolis Group 的政策顾问，并且撰写了许多政策的文章，包括英国和欧盟的。其著作包括《Giddens and Politics Beyond the Third Way: Utopian Realism in the Late Modern Age》(2016)，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这个访谈在 2016 年的 6 月 8 日于英国上议院进行。

PK：你处理了很多议题，包括了结构化理论，历史唯物论，晚现代性，全球化，个人生活和性的转变，第三条路，气候变迁，欧盟的前途等等，而最近则也讨论了科技革命。在你所有的作品中，你觉得共同的关怀是什么呢？

AG：我总体的关怀是去关照现代性的本质，也就是工业秩序的兴起和在世界各地的传布，这是目前最具革命性的一股潮流。对我来说，历史是不连续的，所以没有一种演化性的模型是可以用来解释这个历史变迁的。人们也处在各自的位置之中，在特殊的环境下行动，有着不同的地理和社会脉络，限制了行动者，但也被行动者所形塑。我想我并不同意涂尔干的社会科学观，因为行动者在其观点之中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是具有能动性的。高夫曼是我认为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强调了人门在日常生活中行为的技巧性的本质。许多人也试着把这样现象连结到巨观的解释，这并不容易，但是是很重要的。以前的社会学家所描述的世界好像人们只是巨观社会结构的产物而已。但我试着要去把这个结构和行动的细节解释清楚，而这也是我向来对于沟通和连结有兴趣的原因之一。而我们日常生活和认同的转变和许多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是同等重要的。

PK：所以，若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存在你的作品是用来追求政治和社会变迁的，那会是什么呢？

AG：我想那会是我们正在讲的事情的形式，也就是在人们生活中互动和被更广大的社会结构所形塑的细节。在政治中也是如此。

>>

经过设计的政策从来就是不足够的，而且会有反作用力。

PK：在我2016年的书 《Giddens and Politics Beyond the Third Way》中我强调了乌托邦实在论的这个概念，你还在用这个概念吗？

AG：我仍然用乌托邦实在论这个概念。整体的挑战是去连结乌托邦理想论和现实政治。这是两个极端。缺乏理想的政治是没有目的的。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要必须去想象这种政治的反面。同时，理想就是敌人。乌托邦现实主义似乎就是一个似乎让我们认清现实又让我们保有理想的方式。这是一个让我们敏锐思考政治和事业的方式。在民主政治中，一个只为了赢得选举的政党是不会赢得所以选举的，但也没有人会只讲崇高的理想却不管民众日常生活的需要的。

PK：在你1990年代关于全球化和第三条路的作品中，你会怎么看现在的政治？你有什么事情是觉得仍然和当前的政治有着重要性、但还没有被妥善处理过的呢？

AG：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全球化的概念（个体、组织、国家之相互依赖的增加）是很新的，特别在政治脉络中是如此。让政治人物慎重看待这个概念是很难的，他们会疑惑的看着我。可是后来事情就突然颠倒过来，要让政治人物不讲全球化都很难。但是他们都在很粗糙的层次上谈。不幸地，许多政治人物和社会科学家把这个概念限缩成全球市场的扩散。而全球化的驱动力最重要的就是通讯，特别是在科技革命之后兴起的电子通讯。

我用“第三条路”这个概念其时是有些不情愿的。对我来说，这的确意味着发展一个在政治上左和右之间的一个选项。但我不太把他看成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毫无限制的市场扩张。在我1998年的书《第三条路》中，我说“金融市场的管制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议题”。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积极政府的支持者，这不能被化约成国家，但是可以从许多政府部门而来。我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发展全球治理，虽然极具挑战性。

对我来说，不平等是个关键议题，若任何人看我的作品，就可以轻易知道这一点。现在这议题变得更重要了，因为极度的不平等在金字塔的收入分配结构中诞生，而且生产力减低了，于是工资降低，许多人从事低薪工作。Thomas Piketty的书《资本论和二十一世纪》成为了畅销著作，因为其提供了一个对于结构如何产生不平等的有力解释，以及一些相应的对策。

但是政治是国家的，世界却是全球的。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事情是：我们怎么在国家政治和全球世界中找到平衡。民粹主义其实就在这个空隙之中大量涌现，这也是人们知道国家的政治人物并没有他们必须宣称所拥有的权力。

PK：你觉得有什么方式可以介入这个国家政治和全球化与不平等的这个脱勾之中呢？

AG：我想应该要有方式，而在我讨论欧洲(1)的书中我说到对于避税天堂现象的因应，翻转西方经济的去工业化，以及制造业的重新启动，但会是和以前很不一样的方式展开。这是和科技革命一起伴随而来的，因为一但金钱电子化之后，金钱可以任意在世界上流通，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避税天堂。但是，同样地，对于贪污的金钱也很难藏匿了。我想全球的民意也都反对可以很容易藏匿贪污金钱的机制。

有效（更别说民主）的全球治理只是幻想而已。不过我们的确有许多组织试着要去合作解决全球问题。譬如说巴黎的气候协议会变成怎么样将会是很有趣的问题。该协定会变成空谈吗？我们不知道，不过这和之前的协议有着很不同的形式。你可以看到该协议的确仰想到石化产业。是有可能产生低碳的世界革命的，但是根本的问题的多快达成，或是反过来说，有多慢。马克思说“所有都化为空气了”，而或许那会是结果也说不定，总之我们要看看。总之，由快速、广大的科技革命所导致的新的全球化是我们谈论的重点。

PK：全球化做为时空的压缩已经成为你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透过信息和通讯科技而得以可能，并带来了风险和机会。你认为有可能去掌控它，“乘着全球化巨浪而前进”，或是就是跟着它就好，然后看看会怎样？

>>

AG：因特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网络是前所未有全球化场域，它连结了个人亲密性。但是这只是科技革命的一环而已，其他的像是超级计算机，机器人等。我认为超级计算机是主要的键结。现在的智慧手机比几十年前的超级计算机还要有威力。这个巨大的算法力量进入了日常生活，企业、国家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影响着。这是一个每一件事情都对每个人来说是可见的世界，因为智慧手机已经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面出现了。许多的移民从受压迫的国家逃到其他的国家就是戴着智慧手机找路的。这是一种廿一世纪的移民，就像 IS，混合着中古世纪的暴力和现代个电子科技技术，这是廿一世纪的恐怖主义。

许多人把这个科技革命看成生产破碎的世界，但是许多的创新已经被国家所主导了，并且是透过半军事的目的而得以可能。因特网好像很轻飘飘的，但是那是透过海底电缆和卫星信息的传递才得以可能的，这都是要透过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地缘政治的重新浮现似乎没太意外。大公司和广告是驱动力之一。这是新的环境，影响并非完全来自政治，但是还是透过权力，不论是国家或是企业。没有人会想要一个色情图片随处可得、免费的世界。那或许有害，或许没有。我们不知道，因为一切都是新的。

PK：让我们谈谈当今的政治吧。你有看到对于未来左派的发展有建设性的辩论吗？

AG：我们必须要去试着找到一个中间偏左的道路，第三条路的辩论是从对于我们生活造成的巨大改变所开始的，而我们今天也必须这么做。我们必须看世界上的大变迁，看在政治上怎么样处例，看怎么和既有的国家和国际政治接轨。在工党之中已经发生的和 Jeremy Corbyn 的到来是混杂的，是一种科技的新世代，不过早在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我们左派必须面向未来。我们已经超出所谓第三条路辩论了，而新的想法也是必要的。我不认为事情都变得破碎化，那不是真的。你还是要和权力政治打交道，还是处理大问题，像是在全球资本扩张下的平等社会，以及如何解决避税天堂的问题？所以权力还是重要的。在国家之间和国内民主政治的合作也是重要的。

PK：那把我带到了我最后的一个问题。你相当成功的从学术转换到政治中。我很有兴趣中听听你作为一个在政治场域中的社会学家，对于有志这条路的学者而言，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AG：我在政治之中，但是并不属于政治。我是学术人且一直以学术人自居。我大学是一个对我来说最自在的地方，像家一样。对于参与政治的学术人最怕的是失去两边的听众，因为你必须要背叛学术的客观性，但是却又不是很了解政治，所以很容易进退失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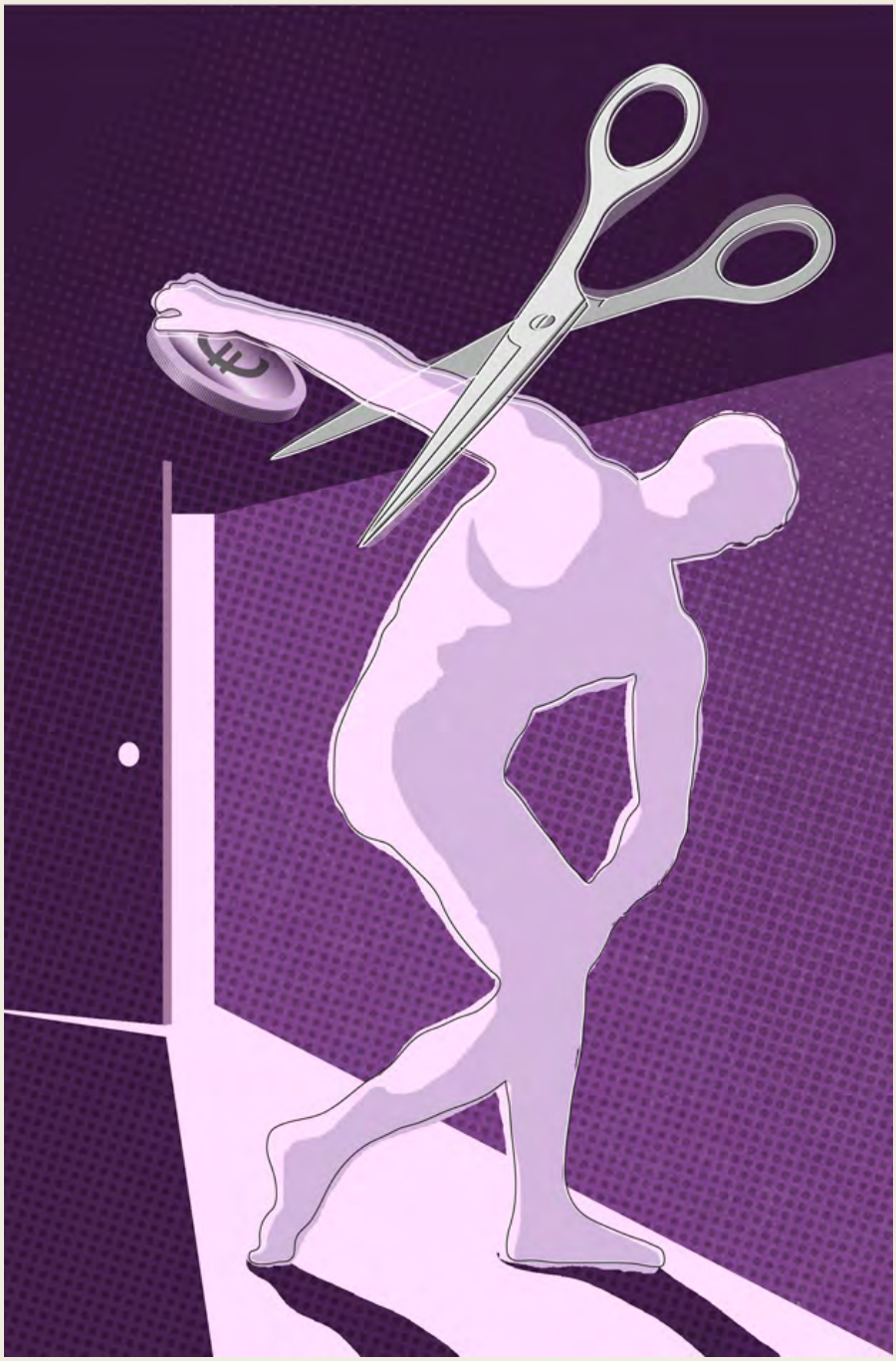
学术和政治是很不同的，所以没有太多人可以连接这两者。智库是两者很重要的桥梁，很依赖学术研究，把研究转译到政策计划中，并且和媒体接近。顶端的智库和政府有很紧密的关系。我不是说这是唯一途径，但是当 1990 年代我决定要和政治扯上关系之后，我接触了公共政策研究中心（IPPR），是少数几个我知道的治物。那里我有办法建立一个政治人物的网络。IPPR 和其他国家也有连结，包括美国。我从来没有成为正式的政治顾问，而也会持续把我自己看成是学术人。■

來信寄給 Anthony Giddens <Ax.Giddens@lse.ac.uk>
和 Peter Kolarz <kolarz.peter@gmail.com>

> 希腊

地缘政治和破产的历史

Vassilis K. Fouskas,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英国



破产而非铁饼象征了希腊的历史。Arbu绘图。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端，于1930年建立，由鲁米利亚，埃维亚，基克拉泽斯群岛所环绕着。希腊的诞生是帝国地缘政治的意外，而非由工业布尔乔亚的经济扩张所导致。希腊的建立被西方的帝国看成是地缘政治上的必要，为了用来吓阻俄国和埃及在东地中海的领土扩张，而不是像是德国容克贵族或是意大利皮埃蒙特那样所进行的政治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地缘政治因素是希腊建国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是了解现在希腊负债危机的关键所在。从现代的希腊创立以来，西方就一直利用着希腊的地理位置，为的是西方的利益，而非希腊本身。

>19世纪的全球金融连结

为了打脱离鄂图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希腊像西方借了很多钱。在1820年代，

>>

希腊分别收到了 800,000 英镑和 2 百万英镑的贷款。这个新的国家在 1824-25 年之间经历了第一次的破产，无法还钱给法国和英国。在 1823-33 年，另外了 6 千万金法郎，全部用在军队开支，这导致了 1843 年的破产。

在 1827 年到 1877-78 年之间，希腊被排除在西方金融市场之外。这 50 年间，各国政府依赖内部借贷，同时鼓励从希腊富人那边得到投资，并和犹太与美国商业阶级买办一起，在鄂图曼帝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希腊低度的工业发展和小规模的经济也让这个高度依赖其他国家的政体在 1893 年再度宣告破产。

然而，尽管其颓软金融和低度发展的银行与工业，希腊在西方国家的眼里还是用地缘政治上利益。当奥匈和鄂图曼帝国撤退后，空档区域就被俄国和西欧帝国主义所介入，现在被意大利和德国所更新。新教的巴尔干诸国对于西方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兴起对抗鄂图曼土耳其的代理人战争。在一次大战结束前，鄂图曼被赶出欧洲，而巴尔干和东欧以及中东的边界都被重新划分了。

在领土与人口的征服之下，希腊在 Eleftherios Venizelos 的自由民族主义政府下有了廿世纪前二十年的工业发展。在英国的支持下，Venizelos 领导了一场代理人战争，对抗在安那托利亚的凯穆尔主义。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虽然希腊有 1.4 百万之多的基督教难民涌入，但是它达到了族群的多元性，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反之，土耳其失去了一些商业阶层，然后依赖威权政府的经济发展，并且无法达到族群和宗教的多元。

在没有强健的经济基础之下，

统治精英和帝国利益的紧密挂勾，希腊没办法有效利用其地缘政治的优势。因此，尽管有优势，却成了负担。于是这产生了付款问题，并且和为了资助侍从主义的腐败政府而使用的内部借贷问题，负债于是不断累积。

>1929 年的金融危机

在 192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希腊在 1932 年遭遇了第四次的破产。其后，独裁者 Ioannis Metaxas 采取的进口替代的工业政策，大幅提升了收支的平衡。此外，帝国的火炬交接给了美国，冷战时代希腊的地缘政治保证了美国资本和贷款的持续流入，让希腊的左派持续边缘化，这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然而，再一次地，希腊又更加依赖。60 年代希腊银行总裁 Xenophon Zolotas 到雅典见美国大使想要借款的时候，被用地缘政治的利益冲突这个原因所拒绝了。该大使说若希腊想要借款，那就必须接受 Dean Acheson 的塞浦路斯计划，这是由北约协商出来的，去分割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岛，并且忽略当时塞浦路斯领导人 Archbishop Makarios。因此，地缘政治的议题和欠债问题有着相互交换的关系。这都是由北约、西方、美国所得利的计划，而美国透过中情局则在希腊扶植了独裁者，只有在 1974 年塞浦路斯被分割的时候民主才被恢复。

从 50 到 70 年代，希腊无法赶上西方。而在这段期间，西方奉行需求面的凯因斯计划，但是希腊却追求的却是后来被称为西自由主义的政策，供给面和货币主义主导，这主要是因为冷战政治所导致。虽然亲俄的左派再 1944-49 年的内战中被打败了，人民还是相当支持，让政府害怕让社会参与政治。政治参与和需求面的经济政策再 1974 年前都是停滞的。

而 1974 年之后，继任的希腊内阁是右翼的 Constantine Karamanlis (1974-81) 和社会主义的 Andreas G. Papandreou (1981-89, 1993-96) 所主导，开启了需求面的循环，雇用了党政人士到政府之中，把私人企业国有化，而特别在 1980 年代资助了希腊的福利国家，透过的是无止尽的借贷，而非增税。即使 1981 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希腊还是持续需求面政策，但是其他西方国家都已经转性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政策了。

再一次地，地缘政治的考虑是重要的。希腊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早了 5 年加入共同体，为的是去稳定北约的南方，同时美国的资本投资在希腊也快光了。1980 年代，德国和法国的资本逐渐占据了希腊经济，并且把国家推向新自由主义，让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资本主义的中转站。

> 欧洲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特别是在 2001 年加入欧盟之后，希腊的竞争优势大幅滑落。传统的可获利的经济像是纺织业已经消失了。而金融和银行则主导了希腊的经

>>

残破的希腊经济。

济，并扩散到巴尔干半岛和近东。公共资产被私有化，整个国家对于外部和内部的融资借贷已经到了把公共资产抵押给外国资本，并且失去了经济的主权。甚至让人认为“依赖”两字都不足以描述这样的处境。

当全球金融危机到了欧盟后，希腊受害最深，因为希腊市政个新自由主义金融市场炼的最薄弱的一环。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和之后的撙节与纾困，这对希腊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并没有帮助。工业倒退了，制度会坏了，大量的负债比和财政赤字。真正需要的是强健的公共投资，工业和农业，以及绿产业。同时，独立的外交政策也可以真正从希腊的地缘位置上获利，避开巴尔干和近东的纷扰。若这无法在欧盟发生，那么问题在欧盟，不在希腊。■

來信寄給 Vassilis Fouskas
<v.fouskas@uel.ac.uk>

> 希腊的国家撙节政策

Maria Markantonatou, University of the Aegean, 希腊

在Athens市中心的小贩在收拾其摊贩。Petros Giannakouris/AP摄影。

欧盟欧盟成立以来就采取了很多海耶克的自由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和财政独立于政治和民主之外。这个计划被中央银行所执行，而且需要不同的经济体参与，即使在黄金时期，这样的政策也没办法让所有国家得利。欧盟的市场走向在全球危机后便得更明显了，即使有政治力量在阻止，但是从 2010 年后危机的管理，特别是在希腊已经使得“社会的欧洲”成为了失败的目标。

从 2010 年开始，经济自由主义便是希腊的政策方向，这是从被国际市场排除之后开始的。过去60年来，各种意识形态的政府（社会民主、右派、左派、科技官僚、联合、临时）也制度许多以“理解备忘录”为架构的政策法律。这些是希腊政府和国际债权人之间的协议。为了让希腊可以得到贷款去偿还债务，撙节措施于是展开，并制定友善企业的法律，方面于私有化的进行，并且从 90 年代开始社会福利就大幅缩减。

从备忘录 1 开始，然后透过今天的备忘录 3，财政纪律已经变成新的教条。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是在忧虑“希腊脱欧”，这种威胁、压力、心理恐惧已经蔓延开来，包括了罢工、抗议、占领、新设运等兴起就是在响应这个局面。

撙节政策的结果是，从 2010 年希腊的 GDP 跌落了 27 %，这彷佛回到了 1930 年代。生活水平急速降低，工资和年金被砍从 20 % 到 50%，税收增加，许多人变成贫穷。公部门支出缩减，而且许多公共财产被私有化。公共组织，包括了公共企业、学校、医院、难民营等都关闭或合并了。剩下了制度则成载过度，无法满足增加的社会需求，所以福利缩减变差，包括了健康、教育、社福等都是如此。

希腊失业率从 2007 年的 9% 攀升到 2014 年的 27%。劳动阶级不再盼望未来。很清楚的是，经济不会马上恢复，而超过一半的希腊青年没

>>

工作，劳动条件危险，新的劳动人口则要面临很多问题。家庭也越来越难，这也挑战了希腊的家庭模式和半调子福利国家制度。虽然家庭模式被认为是未发展资本主义的征兆，这也是欧盟备忘录中的现代化改革所提出的说法，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希腊正迈向欧洲式福利国家。把希腊的家庭模式和剩余福利国家看成是必要的改革，并且强调去管制和迈向市场模式，这意味着今天在希腊社会福利只限于那些有能力买得起的人而已。

这个去管制化还没有成为任何社会行动者对话的结果，也还没形成社会共识。国家和欧盟的决定是不透明的，透过所谓“紧急程序”，这程序只是国家精英的方便门而已，并且在危机中形成，让国家和国际的政治行动者的任务与责任变得更加划分不清。希腊选民已经把政治决定排除掉了，而欧洲经济财政事务委员会则取代了国会。科技官僚则在 2011 年兴起，以及跨国银行就像是首相。同时，国家的手段则形不通，在危机期间被取消或是被看成是取消的。

博兰尼的的意思是经济和社会的分离是市场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希腊就是最好的粒子。市场系统一直是国家有计划的介入的产物，这在备忘录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也形成了或许是欧盟历史中最细致的政治介入例子 >

在博兰尼对于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自由派谴责危机的诞生和自我管理市场的生产是要归咎于某些社会团体。同样地，当代的希腊所见到的普遍的论述就是谴责社会：劳工拿太高的工资，公职人员太多了，社会福利太好了，公共财产太大了。因此撙节就成为了合理的惩罚。这个惩罚是设计来让市场恢复的。

希腊的危机管理就是欧盟撙节制度化策略的一环。一个方式就是财政压缩，给非政治的欧洲组织可以告进一步监视国家预算。但是危机已经浮现台面，结构的赤字和欧洲货币联盟的脆弱已经人人皆知。

因为欧盟的经济已经被导向了竞争的新重商主义，极右派和新法西斯力量也在选举中有所斩获。对欧盟乐观的人已经转向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了，这可是才在不久以前被认为过时的概念。要求“更欧盟”或是“更整合”的说法听起来只是修辞而已，欧盟精英则拥抱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可以延缓撙节或是财政纪律的方式，不让那些正在结构转型的国家去增加给予劳工和公共支出的资金。

惩罚性的撙节，宪法化的财政管制，和新自由主义、欧盟内部的殖民主义让劳动条件恶化，并且开创出了更进一步的危机，也让社会去管制化和政治不稳定更加恶化。只要没有好的计划去摆脱撙节政策，国家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和阶级不平等只会增加，并且让人们以为决定只会被统治阶级精英所制定。欧盟怀疑主义者、反全球化人士对于瓦解欧盟的论证只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听众。问题在于这会以什么样的政治形式展开，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会主导一切？那些争取民主化和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会扩散开来吗？或是欧洲的极右派将会有更进一步的民族主义转向？现在，博兰尼的“双重运动”的钟摆显示了市场力量和其政治代表将要取得成功了，让民主倒退，并且会开启一个黑暗的未来。■

來信寄給 Maria Markantonatou <mmarkant@soc.aegean.gr>

> SYRIZA 从颠覆到实用主义

John Milios, 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thens, 希臘

SYRIZA的集会于Athens。

SYRIZA（希腊激进左派联盟）在2004年成立，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由超过10个左派的政治团体所组成。其形成是在2000年开始酝酿，那时候多数的政治团体是在希腊和欧洲替代全球化运动下的。2001年，上千的希腊左派加入了Genoa的G8高峰会抗议，那可能是最大的欧洲反全球化运动。许多参加者都是后来SYRIZA的成员，总之，SYRIZA便是在这样的脉络下诞生的，后来也取得国会席次。

历史上说来，SYRIZA是由四个传统而

>>

来：共产主义(但在苏共和欧共的只持者之间也有紧张关系)，议会左派(紧张关系出现在托派、毛派、激进欧共派之间)，替代全球化运动，以及希腊的改革社会民主，特别是再2012年选举后该派瓦解(Panhellenic社会主义运动，PASOK)。SYRIZA从2009年的4.6%的得票率到2012年的27%，成长很多。同时PASOK则支持度下大幅下滑，从2009年的44%到2012年的13.8%。而自从1974年的军事统治结束后，PASOK就和右派Nea Demokratia分享权力，但是2015年1月时PASOK的得票只剩下4.6% ，SYRIZA则得到了超过36%的选票。

SYRIZA还在继续成长中。2012年SYRIZA成为希腊最大的反对党，然后慢慢的采取了改革的立场，迈向实用主义，并且在“4%旧SYRIZA”和“27%新SYRIZA”之间做出区隔，这个时期许多前PASOK的成员也加入了SYRIZA。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SYRIZA获得了26.5%的选票，而且似乎将在国内选举获胜，组阁。他们要求党员要“有效”且“安全”地确保选举胜利，许多的SYRIZA领导开始吸引中间偏左的选票。

该党的官方语言或口号也开始改变了。其“组成左派政府”的口号也变成了“拯救民族的政府”。“权力、财富、收入重分配以利劳工”也变成了“国家的生产重建”。民主、人民经济、合作自主的非市场经济等理念也被放到了一边。

SYRIZA的选前政见保证要终结撙节政策，并且处理那些公债。而SYRIZA上台后的几周，那些政见被放弃了，让位了给协商更温和的备忘录和议会同意书，由2015年的财政部长Y. Varoufakis签字同意。Varoufakis从来不是SYRIZA的成员，也不是左派。而且担任部长之后，他迅速地和SYRIZA保持距离。他认为危机对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有相同程度的伤害，主张出口导向，并且拒绝提高工资，否则会降低竞争力。因此，他常提到的70%的备忘录有利于希腊的说法，并不意外。

然而，SYRIZA在选前从来没说要执行70%的备忘录。若有，SYRIZA就不会进到议会了。Varoufakis的看法重新定义了SYRIZA，并且重新洗牌的希腊的左派势力。

2015年的2月，一份协议清楚表示了希腊政府正在谈判一个欧洲新自由主义的撙节架构，就是要找一个壳子去掩盖真正的协议内容。这个壳子包括了一个“终结人道危机”的计划（提供能源补助，食物券给穷人），以及拒绝工资和福利的删减，并且保持支持的遣散和基本货物的增值税系数。而政府则放弃了选前的政策，反而寻求对新自由主义有利的方案，希望可以免于中低受入的撙节。

然而，债权人从未接受那些提案，更不用说透过新自由主义去提供计划去支持希腊的财金状况，像是工资或是年金删减(Juncker计划)。透过5个多月的协商，虽然希腊继续偿还给欧中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债务，政府也从来没有接受那些债权人的提案，这要一直到所有公共资金减少，和国际货币基金付款的延迟之后(2015年6月)，以及政府现金周转不灵后才改变。那周，首相A. Tsipras发起了对于“Juncker计划”的公投，期待希腊可以减少银行的提款(“银行假期”或是“资本控制”)，因为欧盟央行拒绝再借款给希腊银行。

这个公投战役彰显了数十年来的阶级和社会分化。所谓的两个“希腊”相互抗衡，穷的受薪阶级、失业、小企业主等投“不”。而高阶级则说“要”。银行关闭之后，媒体警告投“不”会带来灾难，而雇主都要工人投“要”。然而，2/3的希腊人投“不”(61.3%)。但是在议会里面，议员和保守反对党联合把“不”转成“要”。2015年7月，当SYRIZA签署了备忘录，该备忘录被看做“Juncker计划”，并被描述成黑函的结果，也是欧洲教条精英、债权人、希腊之间斗争下的失败。

这个诠释呼应了SYRIZA内部的声音，把备忘录看成经济的错误，会减缓成长，或是外国利益对于希腊攻击。因此，SYRIZA的最后同意书版本被某些党员看成是“不公平战役的历史性失败”，会在未来被同等的政策所翻转，像是对付贪污或是现代化政府的政策。然而，撙节并不只是“错误的政策”，还是一个阶级的策略，让资本家得利，占工人、失业人口、年金领取者、 经济弱势的便宜。它也没提供什么权利给劳动者，没有社会保障，低弹性的工资，没有议价的权力。

在一些限制之外，完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和社会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政治危机，因为那会激起社会的抗议。这个政治危机是个强大的武器，因为工人阶级和SYRIZA就企图要取消撙节。可是这个武器有个前提，那就是SYRIZA必须坚持自己的政纲，维护优先的政策，以人民优先。

然而，这个策略被放弃了，因为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成功让SYRIZA转向了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支持成长和稳定。这个转变得根源其实在于SYRIZA执政之后的挑战和希腊后斯大林左派的传统里。其爱国主义

>>

Alexis Tsipras是欧洲反撙节的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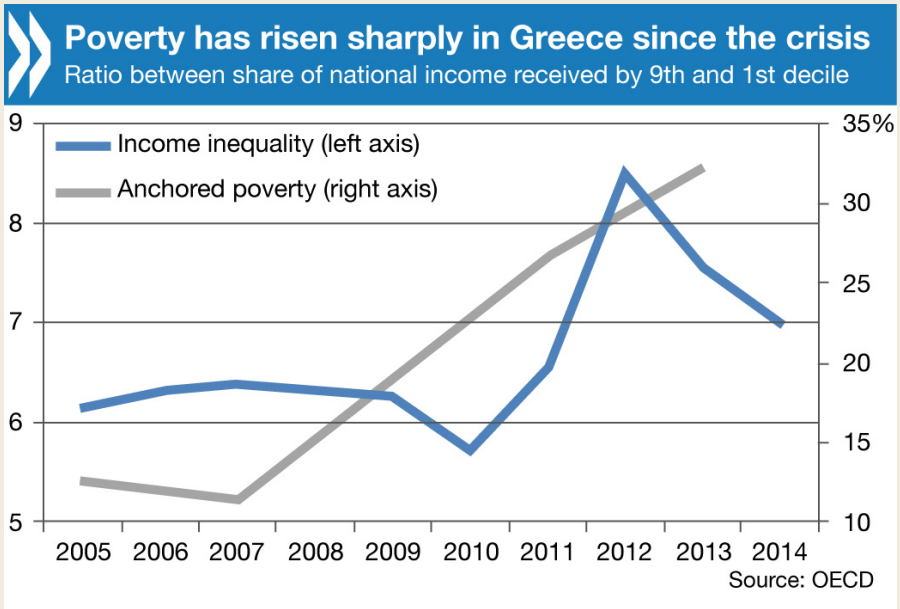
的改革可以从政府主义中看到，也就是组阁是一条迈向政治转变的充分条件，而经济主义则把社会变迁看成是生产力的变化，认为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生产关系改变。

在签署了新的备忘录之后，SYRIZA 同意清理希腊的制度和劳动市场架构。SYRIZA 仍然在希腊左派中实力坚强，但是 SYRIZA 比较像社会民主政党，不是激进的左派了。

來信寄給 John Milios <john.milios@gmail.com>

> 希腊金融危机的赢家和输家

Spyros Sakellaropoulos, Panteion University, 希腊



从希腊金融危机之后贫穷和经济不平等持续上升。

在2010年的时候，首相George Papandreou认为希腊的公共财政太过于惨淡了，所以整个国家无法在全球市场上借贷，因此无法再提供公债了。

和普遍的见解相反的是，希腊的问题并不是由于高工资而来的，也不只是政府太过浪费。希腊的工资只是欧盟15 国的83%而已（这是2004年前的15个国家），若从总体的GDP 来看，公共支出只是在平均值。希腊金融危机是国家统治阶级造成的，并且来自于劳动的国际分工，特别是希腊1981年加入欧盟经济体和2002年欧洲货币联盟之后更是如此。希腊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无法和单一货币竞争造成了GDP的崩坏和增加了债和GDP的比值。

无论如何，2010年早期，希腊希望可以达到偿还法国和德国银行的目标，并且为了避免破产，于是决定要把贷款从欧盟、欧盟央行，以及国际货币组织中拿掉。

但是在希腊可以借贷之前，首先要去实行撙节措施。2010和2016年之间，三个经济的备忘录被执行了，一个中程的计划和八个特别方案，包括了其他的降低工资、年金、最低工资的方案（从751欧元到586欧元，25岁以下只有490欧元），增加增值税从19%到24%，给房地产业减税，西的弹性失业方案，减少公部门雇员，增税，等等。

而这些方案有多有效呢？首先，公债增加了，从200年的3000亿欧元增加到2015年的3144亿欧元。期间希腊经济委缩了，公债占GDP的比例从126.7%增加到179%。同时，失业率从2009年的9%增加到2016年5月的23.5%。GDP从2009年的2374亿欧元降到2015年的1790亿。

这些统计数字揭露了那些政策的失败，但是若再仔细看看，就会发现那些政策

>>

造成了赢家和输家。输家是那些劳工阶级（受薪阶级和中小型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只有15%的失业者领取失业补助，而40%的是可以合格接受补助的。无法接受补助但是合格的人口从11%增加到20%。今天，超过一百万的希腊人其家庭里面是没有人有工作的，或是有人超过半年没有工作。50%的年金领取者只领500欧元/月。从2009到2015国家总体贫穷率从27.6%增加到35.7%。

即使那些还保有工作的人，收入也减少许多。GDP总体从64%降到54%，总工资也掉了三分之一，平均购买力也从84%降到欧盟15国的平均 65%。在2008和2015年之间，427,000的希腊人搬走，多数拥有大学学历。2008年有849,289家企业，但到了2014年只剩下692,286 家。不平等恶化了，富有的20%和贫穷的20%比例从5.6/1降到6.6/1。

希腊的人口数据也显示了生活水平的降低。健康支出掉下了25%。2011和2014年间，出生和死亡人数都较少，婴儿死亡率到增加了51%。

但是谁是赢家呢？在那些大赢家之中，多数是外国银行，而这些银行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就持有大量的希腊国债。2010年6月，公有和私有的债总共有2521亿美元，75.1%属于法国(831亿美元)，德国(654亿美元)，和美国(362亿美元)的银行。2010年12月前，外国银行的持债比例降了 42%，到了1457亿（法国567亿， 德国340亿，美国73亿）。在第一备忘录中，银行可以有充裕时间卖掉持债，这到了2011年12月更明显，因为总债降到了350亿美元。2012年大选之前，外国银行几乎卖掉了手中所有的持债。

对于希腊的赢家来说，2010年最赚钱的公司获利了22亿欧元。2014年前增加到了102亿。前300大公司（除了金融业）在2009和2014从53.6%增加到了59.8%的获利，而资产也从42.2% 增加到了44.0%。

最后，2011年的时候，445人有超过3000万欧元的财产，总共500亿欧元，是GDP的24%。2014年前这个群体又稍微成长了些，有565人持有总共700亿欧元，是GDP的39.5%。 在2014年，这个精英群体包括了11个希腊亿万富翁，总共资产到达180亿。2013只有160亿。

这些发展反应了希腊的社会阶层化。按照调查指出的，希腊布尔乔亚占2.8%的GDP， 但2009年跌到3.2%)，农业阶层占0.6%的GDP （从0.7%掉下来），小布尔乔亚7% （从7.3%掉下），新小布尔乔亚21.9%（从29.5%掉下），中间农业阶级1.2% （从1.9%掉下），贫穷农业阶级则有7.3% (7.4%掉下)，工人阶级则是59.2% （从49.1%上升）。

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政策，这有着重大的意义。大型的外国银行在国际的金融制度和母国的引导下，不断获利。尽管某些部门的经济液态化导致了损失，国家的经济精英却财富增加了，并且到过剥削在地劳工阶级和中小企业的挤压而得以可能。■

來信寄給 Spyros Sakellaropoulos
<sakellaropouloss@gmail.com>

> 希腊纾困 是国家和企业的联合犯罪

Stratos Georgoulas, University of the Aegean, 希腊

纾困让谁获利了？

国际的学术社群已经开始试着去定义“国家和企业的犯罪”了，意即非法和社会危险的行动是透过国家治理制度和经济生产与分配的互动所造成的。从政治和研究的观点来看，这个词是和“贪腐”连在一起的，但是两者有重要的区别。首先，只所以称为“犯罪”是为了保护人权，因为那些行动让许多的人性命伤亡，损失财产，让一般意义下的犯罪活动猖獗。第二，这种“联合犯罪”的根源是和政治与社会行动紧密结合的，国家和资本也是相互依赖的，不论是直接把公共资源转成私人交易，或世界由影响特定政策，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

此外，国家企业的联合犯罪不只如此而已。所以，“全球化犯罪”有了个有趣面向，特别是当超国家的制度像是国际货币基金或是世界银行对于整体人民造成了伤害的时候，更是如此。由上而下的的政策和经济方案和那些强国与跨国公司的行动大大影响了人类，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重新偿债”的计划导致的政治不稳定，让家父长或是恩僻侍从主义兴起，增加组织的犯罪，贪污，威权主义，国家迫害，刑求，甚至是种族屠杀。

在希腊的备忘录政策是由政府和国际组织所协商制定的，包括了那些国际放款银行，这些都导致了违反人权的情况产生。那些政策在“纾困计划”的名义下被执行，影响人民的生活，违反人权，这些都不被希腊或国际法所允许的。总总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包括了生活水平的降低，社会正义的侵害，社会团结的瓦解，民主与人权的违反。那什么样的人权被违反了呢？接下来我们就逐一讨论。

•工作权。由备忘录所制定的劳动市场改革严重地削弱了工作权，造成了制度的崩坏。消灭长期以来的集体议价权和劳动仲裁被取消了，而薪资删减和增税也造成了裁员和劳动水平的降低，增加就业风险，让女性和青年必须从事低薪和弹性的工作。最低工时被减少到了贫穷限的水平。

•健康权。2010年的经济调整方案限制了公

>>

共卫生的支出只能占GDP的 6%。2012年的方案则减少了医院的营运开销8%。医院和药局的总支出也被迫从2010年的43.7亿欧元减少到2014年的20亿欧元。

•教育权。备忘录中删减了教师的雇用名额，减少教师薪资，合并或关闭学校，增加班级学生数量，延长周末教学等等。许多教师名额空着，2008和2012年之间，1053所学校关闭了，1933所合并了。预算删减让许多学校没有暖气。

•社会安全权。以备忘录为基础的支出删减侵害了社会福利政策，包括了年金，失业补助，家庭补助。2010年开始年金又减少了40%，让领取补助的人之中有45%成为贫穷人口。

•居住权。希腊在2012年取消了社会住宅，这是一项“行动前行动”，为的是为了提供组金补助给120,000户家庭和给老人补助的政策做准备。新的法律让拆迁行动可更快速执行，不通过法院途径。在2014年，有超过500,000人是无家可归的。

•自决权。国有财产的私有化，特别是经过“快速审查”的那些案子，事实上都是违宪的，因为宪法明定了人民主权、财产权，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司法权。债权人提出制定的方案要求希腊政府要去改革其司法制度，包括提高诉讼费。法律途径对于民众来说已经越来越困难和越来越贵了，特别是他们的薪水和收入又被减少的情况下，更是糟糕。

•言论自由权。2010的立法和行政方案中限制了言论表达和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权倍系统性地挑战，集会自由也被侵害。政府也禁止抗议那些备忘录的法案，禁止公共集会，打压和平抗议，逮捕抗议民众，甚至刑求之。政府和法西斯色彩的政党Golden Dawn合作打压言论自由。

今天，有23.1%的希腊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而此贫穷率也再2009到2012年增加了一倍。而其中的三分之二甚至变得更穷了。严重的物质匮乏率(占总人口)也从2009的11%上升到2014的21.5%。2013年有34%的小孩暴露在贫穷危险中，而10% 的人口失去了 56.5% 的所得。

同时，希腊社会也历经了违反人权的经验，立法机构制定了“给特权阶级的政策”，让贪污猖獗。这个立法有很多面向，而且开启了一种犯罪免罚的制度，让一些特权的人可以免于被起诉，特别是那些有和政府签约的公司，如西门子，或是军火商和私有化政策有关的。该制度也让立法机关可以介入那些已经在审判的案子。讽刺的是，即使债权人要希腊解决逃税的问题，他们却要取消26%的跨过交易税。

国家企业犯罪是超出个人犯罪的，因为他们变成了常态，是这个失序社会的特征，也就是集体的代表和意识已经削弱了，这样的国家企业共谋是这个时代的精神。

我们面对很严峻的挑战：要做什么才可以对抗这个不受控制的国家企业犯罪呢？这就像20世纪初期的法西斯主义一样，有着正式的社会控制，现代制度，科学论述被治理、生产、社会的的结构所扭曲了。

继续怀有梦想是很重要的，而且，就算这个国家和企业的共生已经存在已久，但从来没有被完全接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学者和公民，我们应该持续关注和质问。■

來信寄給Stratos Georgoulas <s.georgoulas@soc.aegean.gr>

> 米索前列醇时代的阿根廷堕胎权

Julia McReynolds-Pérez, 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 Crosse, 美国

在圣母像上有女性潮流所留下的讯息："妳的选择，安全堕胎"，并且有热线咨询的店化号码

拉丁美洲的堕胎辩论经历了场大地震，震央是一个白色小药丸。米索前列醇的可取得性改变了堕胎的执行与实做，且影响很大。新的自助运动策略，其中包括了女性主义者和健康专业人士，也改变了堕胎的辩论。尽管合法化的反对声浪很大，而运动者也让堕胎更可取得，更可见。

堕胎长期以来在拉丁美洲就是不合法的，而拉丁美洲也是最天主教的地方，不过堕胎的执行却是相当常见。拉美的富有女性已经悄悄地使用安全隐密但是昂贵的堕胎方式，但是贫穷的女性则往往使用高风险的方式堕胎。

这两种隐密的堕胎方式激起了很大的辩论，关于合法性的问题是辩论重点。但是堕胎的执行和相关政治已经从 1990 年代改变了很多。米索前列醇是一种被美国药物食品管理局所认可的合成前列腺素，主要用来治疗造成泌尿感染的溃疡，但这变成了堕胎的有效药物。在那些堕胎合法化的国家，米索前列醇通常和其他药物一起服用，像是米非司酮，主要用于第一起的药物堕胎。重要的是，米索前列醇若自行服用，没有经过医师的协助，还是比密医执行的堕胎要来得安全。

在 2012 和 2015 年之间，我在阿根廷做田野去了解这个新的药理科技怎么改变了堕胎的政治。在阿根廷（的确也在整个拉丁美洲），米索前列醇的轻易可取得性已经开启了新的运动策略。许多堕胎权的运动人士与团体开始加入跨国的抗争。2001 年 Rebecca Gomperts 博士展开了"浪潮上的女性"运动，把堕胎科技的船只和国际浪潮带入了那些堕胎不合法的国家，要请女性搭上这个浪潮，使用安全的堕胎。

>>

米索前列醇，常用的引产药物。

在这个运动之后，她开启了一个“网络上的女性”的运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购买堕胎的药物或方法。其会把不标示的包裹寄给那些堕胎不合法国家的女性。Gomperts 的组织也支持堕胎咨询热线，提供使用米索前列醇的使用信息。

虽然 Gomperts 博士的跨国努力吸引了国际的媒体注意，但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地方的运动策略如何响应新的机会结构。在拉美，年轻的女性主义运动者积极争取女性使用米索前列醇的权利，让贫穷的女性可以取得这种堕胎方式。有些团体提供信息，其他则提供临床服务，专业人士则开始介入整个医疗体系的改革。

同志女性主义支持堕胎去罪化（Lesbianas y Feministas por la Descriminalización del Aborto，简称 LFDA）已经成为了过去 7 年来阿根廷最重要的堕胎权运动组织。LFDA 一开始设置了堕胎热线，并设有“女性在网络上”，提供安全堕胎的信息给阿根廷的女性。此外，从 2013 年开始，LFDA 设置了面对面的堕胎咨询服务，主要在 Buenos Aires，运动者提供了完整的信息，让人们了解如何安全地引产，并以简单，非技术性的语言沟通之。但是接受咨询的人则要有办法无论是从药局或是黑市中拿到米索前列醇。

LFDA 就像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运动团体一样，认为自己是受到“信息自由”的规范所保护的，以及还有公共卫生对于“伤害降低”的要求。第一个论述是奠基在他们只有提供那些可以透过其他方便管道得到的讯息。另外，他们并没有提供堕胎药物，所以不提供医疗服务，只有提供讯息。“伤害降低”的说法是从公共卫生领域的论述中借来的语言，类似提供免费针头的概念一样，宣称要透过社会责任的方式去处理那些非法行为可能带来的健康危险。

其他的运动者则更进一步。因为从 2014 年开始，地方的团体联盟开始了一个名为“第一线上响应者”（Socorristas en Red）的全国性运动，这个在线网络不仅提供信息，还有“补助”（acompañamiento），像是米索前列醇或是药理上的堕胎处方（但需要透过跨国的运动者去联系），此外也有够过手机提供在家堕胎的咨询服务。因为这些团体提供堕胎药，不只是信息而已了，所以它们多数很低调。像是比较自由的城市如布宜諾艾立斯，其运作就比较公开。可是在许多的保守地方，运动者还有赖接受服务的人审慎小心行动才可免于受到起诉。

最后，有些健康专业者也开始从内部去改变阿根廷的公共卫生体系了，提供所谓的“事前事后的堕胎咨询”。而像 LFDA 运动者，这些服务也包括了仔细的米索前列醇信息，并且透过让女性自己取得药物或是在家堕胎而避免了合法性与否的难题。在一些的服务据点，这些运动者和专业人士也受到官方卫生单位的支持，或是受到的是善意的忽略。有些组织甚至可以将堕胎看成是“合法的中止怀孕”，认为那些非自愿的怀孕是一种健康危险，所以所有的堕胎必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去保护女性的

>>

健康。他们直接提供堕胎服务给看诊者，但是我访问的人告诉我，他们通常是私下提供米索前列醇，并且会要病患保密。

我们没有办法去正确估计有多少的医生愿意提供这样的诊断，不过这些医生一定是少数，因为在医疗专业阶层的体系下，掌权者是那些保守的、天主教的老男人们。但是体系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则是很明显的，特别是从运动者所收集的数据中可以看到这点，因为那些数据让大家可以知道非法堕胎所反映出的健康议题。报告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论文也被专业医疗人员透过会议的方式公开了。此外，运动人士也撰写了影子报告给联合国的消除一切对妇女歧视之公约委员会。这已经变成我所称的“女性主义流行”。

重要的是，阿根廷倡议药物堕胎的运动彰显了保守的国家法律上的失败。的确，政治上其实很少人会真正想要起诉堕胎的实做，特别是若要真的起诉的话，其实会激起大众对于年轻女性的同情心，他们会被看成是过度执法的牺牲者。按照运动者收集的资料来看，上万的女性接受过中止怀孕的帮忙并且安全无恙。同时间女权团体也继续要求堕胎的合法化。

然而阿根廷最近的政治变迁让女性主义者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中。2015 年晚期，右派执政了，替换了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的中间偏左的政府，他们对于堕胎是持相反意见的。

最近国际人权组织谴责阿根廷以谋杀罪名处罚一名在 Tucumán 的年轻女性因为在医院寻求流产的协助，因为米索前列醇被广泛使用，也因为其使用无法在事后被证明，保守派医生倾向去怀疑所有流产的女性都有使用这个药物。在这个情况下，Belén（化名）被判 8 年徒刑，这是很重的刑，特别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她的流产过程是否使用这个药物。但判刑确定后，阿根廷各地的女权团体游行要求释放 Belén。政府在遭受到巨大压力之下，2016 年的 8 月，Tucumán 的法院释放了 Belén。

而阿根廷的政权交替将会给堕胎权运动带来阻力吗？运动会被镇压吗？会有更多的 Beléns 吗？虽然这个右派政权很令人担心，但是很运动者很清楚地不会退缩，而过去 20 年来，他们的努力已经大大转变了阿根廷的堕胎政治，而运动者也希望进步不会有所倒退。■

來信寄給 Julia McReynolds-Pérez <julia.mcreynolds@gmail.com>

> 墨西哥对堕胎权翻转

Susana Lerner, El Colegio de México, 墨西哥, Lucía Melgar, 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 墨西哥 和 Agnès Guillaume,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法国

墨西哥政府将要合法化堕胎。

2007 年，墨西哥的联邦区（Distrito Federal，近期改名墨西哥市）将 12 周的堕胎合法化，这是对公民社会来说的一项胜利，因为公民社会自从 1990 年代开始就开始争取。但是在墨西哥的多数地区，堕胎的限制却越来越多。

从 2008 年开始，有新的法律和宪法改革被提出来要去“从怀孕的那一刻开始保护生命”。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发生再 2016 年 7 月的 Veracruz。我们要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所谓的改革呢？而影响又是为何？

这些相关辩论和主要的行动者必须被放置在更广泛的人口政治脉络下来理解。从 1970 年代开始，墨西哥政府就推动的家庭计划，目的是要减少生育率，提供女性方法去控制家庭人口数量，并且改善家庭健康与幸福。尽管成功地减低的人口成长率，但是在缺发经济和社会配套政策的情况下，人们的物质条件并没有增加。

在 1990 年代，墨西哥政府再次肯定了 1994 年国际人口和发展会议的行动方案（Program of Action），所以国家的政策转变到“生育健康”的焦点上。这个方案在 Cairo 签订，以性别和生育权利为优先，认为堕胎在某些不适合的情况下执行会是个问题，并要求签署的国家允许女性可以取得安全的堕胎管道，并移除法律上的障碍和放松堕胎限制的法律。

在过去 20 年间，女权团体和学术专业社群已经不断施加压力给墨西哥市去合法化堕胎，也取得了进展。2007 年，该市的立法机关同意了 12 周的堕胎（虽然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堕胎还是不合法的）。重要的是，借着定义怀孕为“人类再生产的过程，开始于胚胎的着床”，墨西哥市的改革必开了生命何时在哪里开始的讨论。在 2007 的法律中，医生或许可以拒绝执行堕胎而成为“良心上的反对者”，但是法律订定健康机构必须要有不反对堕胎执行的医生才可以。自由派政党，包括执政的 PRI 投票赞成，但是右派政党 PAN 则反对。

法律借着要求公卫服务提供安全的堕胎，保障了女性的合法中止怀孕的行为。重要的是，法律允许怀孕女性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做，可以继续，或是将小孩

>>

寄养，或是中止怀孕，只要在被告知同意之后即可。此外，避孕的措施也提供给那些非预期的怀孕的预防（然后减少将来的堕胎）。

因此，墨西哥市的改革把不安全的堕胎诠释成为公卫、社会正义、歧视的议题，总之，其保护了人权，承认了女性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与性作主和做出决定。过去的 9 年间，这个改革让超过 160,000 的女性有安全堕胎的管道，而且不仅在墨西哥市，还包括其他可以到该市看诊的人。

保守的势力由天主教福音教派等所主导，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响应。就像其国家，保守派坚持“捍卫生命”要求女性的自由和生命必须对胚胎权有所让步，因为胚胎已经是“人”，并且拒绝承认不安全的堕胎现实，或是那些衍生的家庭和健康议题。另外一方面，女权团体则捍卫女性的自主权利，认为母职必须奠基在女性的自由意志上的，还有坚持政教分离对于末吸个民主的核心价值。

因为墨西哥市允许第一期的堕胎，像是 Provida（支持生命优先），Profamilia（支持家庭优先），和墨西哥天主教法律协会的组织认为“生命开始于胚胎着床并且拥有权利”。反堕胎的人士试过了很多策略，包括了上街抗议，要求主教有所行动，限制女性取得堕胎方式，游说立法等。相似地，他们反对同性婚姻（已经被合法化），并且反对家庭计划和公立学校的性教育。他们成功地取消了“性与生育权利”的词。

2008 年，保守团体在最高法院判决前跑出来挑战改革。虽然最高法院认为堕胎合法化是合宪的，其判决则是以另外 3 个事实为基础。首先，法院明定了女性身体的自主权，而国家必须保护女性的权利，让她们可做出关于身体或心理健康的决定。第二，法院判决生命权不是绝对权利，或是“超权利”，无法超越宪法或是国际法所明定的权利。所以当权利有相互冲突的时候，立法者必须考虑提供替代选项。第三，以第二点为基础，法院让在地的立法机关可以更改相关的法律。

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之后，保守团体转向州立法院，试图去更改州的宪法或是刑法，要求“从受精最一开使的时候就去保护生命”，并且惩罚那些堕胎的女性。

在 2016 年中之前，反堕胎权的势力在有天主教、所有政党的立委的支持（包括了一些左派）之下，其在 18 个墨西哥的州达成了其目标。因为这些通过的新法案，墨西哥女性必须为了“谋杀亲人”（亦即杀婴）而坐牢，有些最重可判达 20 到 30 年。其他的还包括要接受心理治疗，这意味着自己的身体自主性是个心理疾病。这些新的处罚代表了墨西哥政府无法遵守墨西哥的法律，因为法律明定在某些情况下堕胎士被允许的，像是强暴（这也是唯一全国都合法情况），胚胎异常，或是对母体健康有威胁。

2016 的辩论仍然包含了两个互斥的立场。保守团体认为是“捍卫生命”，将女性的生命和自由从属于所谓的胚胎权，并认为胚胎有法律地位。这些团体并没有考虑到不安全堕胎的后果，像是母体死亡或是疾病，或是对于家庭的影响。自由派团体则强调女性权利的重要性，母职的自由选择，以及健康的普世权利，要求墨西哥宪法中核心的对于世俗国家政府的尊重。

墨西哥争取女性的权利的运动仍然持续着。但是女性团体再面对保守派要将堕胎入罪的时候，通常比较被动响应而非主动出击。这样的动态必须被改变。我们认为，公民社会必须夺回自己的声音，要求全国层次的堕胎解放和合法化。■

來信寄 Susana Lerner <slerner@colmex.mx>, Lucía Melgar <lucia.melgar@gmail.com> 和 Agnès Guillaume <Agnes.Guillaume@ird.fr>

> 堕胎作为暴力 秘鲁的斗争

Erika Busse,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秘鲁，ISA迁徙研究委员会(RC31)，女性与社会委员会(RC32)，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社会变迁委员会 (RC48)，家庭研究委员会(RC06)

反堕胎的“保护生命大游行”，于利馬，秘鲁，2013年3月23日。Paolo Aguilar/EPA摄影。

2016年8月中，上千秘鲁公民到利馬的街上抗议，喊着口号：“Ni Una Menos”（不要少一个）。抗议者的身影中包括了刚刚当选的秘鲁总统，性暴力的受害者，女权团体，政党人士，还有立法委员。这个游行谴责对女性施加的各种暴力，参加者包括女性、男性、家长、小孩等，所以游行也被描述成秘鲁40多年来最重要的社会运动。

游行抗议的高潮是放映了一部影片，影片中的女性在饭店柜台前面硬生生的被前男友抓住头发拖着走。但是这个案件的审理法官却认为该女性的受伤证明了没有强暴或是谋杀的企图。

“Ni Una Menos”游行的

>>

口号是“当一个女性受害，就是全部女性受害”，要求秘鲁大众一起抗议对待女性的暴力和歧视。游行发起人对于大众的响应相当惊讶，而这样的响应也和拉美其它国家对于女性和法律的歧视所做出的响应是一致的。对于许多的拉丁美洲人来说，这个游行是个希望：改变发生了，而女性议题，特别是暴力，也成为了公众的焦点。

聚焦在女性遭受到的暴力的议题上是一个拉丁美洲女权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改变了对于生产权的诠释框架。重新把关于堕胎辩论诠释为“对于女性（弱势）的性暴力”和强调“被强迫的母职”（或是被迫秘密堕胎），女权人士重新把辩论引导到国家对于性暴力防治的失败，这和把堕胎看成是生产权利的论述相当不一样。

女性遭受暴力的这样一个框架反对把女性堕胎视为是“自私”的行为，并且把女性遭受到暴力的迫害当成是道德议题。若要反对这个框架，那就必须要说女性没有遭受暴力相向，或是不重要。不过，这样的框架的确有可能弱化了女性，加强了性别的刻板印象。但是，这样的框架似乎在堕胎合法化的案例中受到更多人的支持。

运动者不只是在合法化上面做努力，还诉诸公民社会的支持，也争取专业和宗教人士的支持，试图改变秘鲁人思考女性权利和暴力的方式。从生育权利到性暴力防治的思维也让运动可以扩大，把 LGBT 的运动者、女权草根、天主教、年轻人、名人等纳入。强暴案例中的堕胎去罪化似乎得到了大众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少数女性主义者的背书而已。这个运动结合了由下而上（收集联署）和由上而下（电视广告、名人、艺术家、政治人物、公民）的方式，并和团体如 Alfombra Roja （红毯）合作，招募到了许多支持者。在公众不信任政府的氛围下，这种运动策略也让民主更加深化。

目前为止，这个新的诠释框架并没有办法产生立法者的强大响应。例如，过去曾经有努力想要把强暴案例中的堕胎法化，但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类似的还有国会中要把强暴案例的堕胎去罪行化的法案仍被束之高阁。显然地，虽然立法者会同情遭受到暴力对待的女性，但是像强暴这种暴力所导致的非自愿怀孕的案例中，胎儿或是母体的权利该如何对待还是辩论的焦点所在，暴力变成了次要的议题。

即使如此，公共相关的论述和政策还是有稍微改变一些。1924 年的秘鲁刑法中是不把医疗堕胎当作犯罪行为的，只要怀孕女性是有危险的就可以，但是却没有明文允许医疗人员去提供堕胎的手术，这代表了医生很有可能因为替病人执行堕胎手术而锒铛入狱。而接下来的 90 年，多数的医生都不太愿意执行堕胎手术，

然而 2014 年的时候尽管有着广泛的批评声浪，特别是来自于天主教和福音教派的批评，秘鲁最后还是实行了医生有权判定是否可以中止危险怀孕的法规。不过完全的执行还是有困难，因为有些医生不知道怎么执行堕胎手术，女性也缺乏信息，并且害怕和羞耻的情绪会让怀孕的女人很难寻求协助。

这个法律的采纳指出了把堕胎诠释成女性的健康或许是比诠释成生育权会来的成功。就像“Ni Una Menos”游行指出的，女性的议题或许已经移到了秘鲁的政治辩论核心地带了，但是不论是否将会带来大的改变，特别是对于女性死亡的对待上是否会改变，我们不知道，还有待观察。

來信寄給 Erika Busse <e.busse@up.edu.pe>

> 简介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学

Mohammed A. Bamye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美国,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 ISA异化理论研究委员会(RC36)和传记与社会委员会(RC38)会员

“新时代的新知识”可谓总结最近出版的报告“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科学”(http://www.theacss.org/uploads/English-ASSR-2016.pdf)[1]。这是由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ACSS)所出版的，该报告的撰写时间长达了两年，并由许多的研究者贡献而成。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是一手的，并且是研究团队所收集。

报告提供了量化和质化的资料，分析了阿拉伯世界的大学、研究中心、专业社群、以及期刊，试图描述社会科学在阿拉伯世界的本质。此外，该报告也分析了公共的社会科学，包括了公民社会组织如何使用社会科学，以及公共领域的社会科学使用，像是报纸，电视节护，文化刊物，以及大众杂志。

我们也纪录了在22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机构的指数型的成长，特别是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成长。要指出的是，大专院校在90年代才开始成立，而学术期刊在80年代以来已经成长了4倍之多，研究中心则是至少6倍。可以说是一个宁静的知识命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但是我们所知甚少。

有趣的是，这种知识机构的扩张似乎和国家的财富是无关的，因为在有钱和贫穷的国家都看到这样的趋势。研究自由似乎是主要的因素。强健的公民社会推动并且受益于社会科学研究。知识阶级、国际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兴趣、以及在地组织和全球社会科学的连结等因素都有关。公民社会的成长则和社会科学的成长相关，两者也和阿拉伯之春(2010年展开)的解释因素相关。

报告也纪录了在阿拉伯的大学内部的不平衡现象。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领头者，包括了四分之一的教职员。最少的是人类学，只有2%，而其他则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然而，多数的阿拉伯大学非常重视较学，意谓着那些想要做研究或是从事民间活动的学者不会找到太多的诱因。而研究中心则填补了后面的这些需求，主要因为中心是透过主题而非学科去组织起来的，所以会比较推动跨学科研究和社会介入。

有趣的是那些富裕国家，像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对于研究活动并没有比较关注。这个发现直接地和最近的国际排名指标相抵触，而事实上，这些指标对于反应真实的阿拉伯知识活动是没有太大帮助的，部份是因为它们偏好那些发表在欧洲语言的特定其刊上面的活动。这些排名似乎只在乎学术的阶层并助长之，而对内容并不感兴趣，也不重视社会科学的相关性与使用。

报告几乎有一半的篇幅是讨论公共领域的社会科学。公民社会组织、报纸、大众杂志、电视、文化期刊等的分析显示了社会科学知识通常以缩短的形式被呈现。报告发现了所有的公民社会组织使用甚至生产了社会科学知识，不过是以他们的目的所需求的形式呈现之。这也告诉了我们在阿拉伯摄科学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能见度上有某种相关性。而其他的公共领域媒体中，文化刊物对于社会科学的态度是开放的，大约有20%的篇幅是社会科学，但是是其文化社群所关怀的方式去呈现。报纸、大众杂志、电视节目中则比较看不到社会科学的影子。不过量没有比质要来的重要，因为我们在巴勒斯坦报纸《Al-Quds》或是科威特的杂志《Al-Arabi》中都看得

>>

“全面的社会转型的阿拉伯社会科学的主要关怀。”

到代表性的社会科学报导。

全面的社会转型，不论是革命性的或是改革性的，都成为了阿拉伯社会科学得主要关怀，这特别发生在过去五年间(2010年1月到2014年12月)。我们对于这段期间的内容分析显示了“阿拉伯之春”成为了社会科学家的最关心主题，其他的还有“民主”、“权利”、“裙带主义”、“参与”、“公民社会”等等。报告也发现了女性议题也相当受到注意，并且在所有的媒体型态中都可以看到，也和权利、公民身份、参与等相关，而非和“传统”的议题像是家庭或是小孩。社会转型的议题，像是“青年”、“教育”、“发展”等受到比较少的关注。有趣的是，有些主题是缺席的，、像是“穆斯林世界”。这个概念在西方是有意义的分析范畴，但是阿拉伯的社会科学家则几乎忽略了它，应该是因为他们并不把“穆斯林世界”当作一个整体的分析类别。不过他们的确分析“伊斯兰”和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该报告总结道，尽管政策制定者通常忽略这些研究，阿拉伯社会科学逐渐将自己形塑成当代阿拉伯知识地图的重要一部分。未来的类似报告以两年的时间为单位去进行规划，目标是纪录其对于全球社会科学和当地社会的贡献。■

來信寄給 Mohammed Bamyeh <mab205@pitt.edu>

註 1：Mohammed A. Bamyeh 是作者。

> 阿拉伯世界新社会科学的下层基础

Seteney Shami，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会长(ACSS)，黎巴嫩

第二届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会议，2015年3月。

阿拉伯地区面临了社会经济、环境、政治、安全等的挑战。同时，它也缺乏了强大的学术和研究能力去理解、分析、辩论、响应这些挑战。就像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阿拉伯国家对于知识的需要是必须要有更好的能力、质量、范围、以及影响，特别是社会科学。

这样的觉醒已经让许多过去十年来聚焦在这些挑战的计划不断产生，并且也有更多的奖学金机会提供给学生去读研究所。许多的学术成就奖项也被设

>>

置了，专业社群也缓慢的成长。可是，社会科学的机会和机构还是有限，并且阿拉伯地区的跨国机会也少之又少。

在这个脉络下，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由社会科学家设想和发展起来。第一次的会议是在2006年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而当大家在规划组织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中东被2010阿拉伯之春给震撼到了。这些事件帮助开启了空间和辩论，并带来了希望和机会去改变。对于现状的质问和社会新视野的迫切需要，以及新的架构去再现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都相当重要。街头上就可以看到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运动之后带来的是新威权主义、不安全、暴力、战争。但是，撒下的种子不断地长大，不受到监视和迫害的影响。制度也扩张了，有趣的方案也提供了在制度上以及学术和运动之间合作的可能，也带来的新的社会科学教育机会（像是在线课程、集体阅读，或是NGO的“teach-ins”）。生产和保护学术的自由将会是这个地区未来的生命力。

>ACSS

ACSS（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是一个非营利的会员组织，其总部在黎巴嫩的Beirut。其主要的工作是去推动社会科学在地方和全球的发展（广泛定义下的）。至今ACSS已经运作4年了，有7位全职和2位半职的工作、顾问、行政、财政人员。ACSS也在巴勒斯坦成立了分部，有半职的资深顾问和行政财政人员。第二个分部预计在阿尔吉利亚设置。ACSS也设立了4个奖助计划，提供研究经费、双年的会议、双年论坛、年度的讲座，还有网站和社群媒体。其已经奖助了超过130位研究者，有超过270名成员，提供旅费和训练，以及交流机会。

尽管在阿拉伯地区经历了及大的变化，ACSS原本的任务和价值是在2008年的一场会议中确定的，而且仍然有效，扮演重要的角色。（请见http://www.theacss.org/pages/mission）。ACSS的原则是推动质精、包容、弹性、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且也评估需求，提供机会，注重年轻研究者的培训和发展。

ACSS的其中一个重点计划是“阿拉伯社会科学关注”(ASSM)计划，其分析了社会科学在该地区的近况，第一个报告“阿拉伯地区的社会科学”是由Mohammed Bamyeh所执行，分析了区域的制度和实质知识地景(http://www.theacss.org/uploads/English-ASSR-2016.pdf)，描述了该地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兴起和成长。该报告也强调了阿拉伯世界社会科学缺乏了硕士和博士的设置，也缺乏期刊和专业组织等那些让一个强健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可以茁壮的制度。不过从好的方面来说，报告也描述了社会科学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像是文学、报纸、大众杂志、电视、媒体等。

>阿拉伯社会科学：边缘化或是浮现中？

在阿拉伯地区，官方对于社会科学的忽略反映了发展和现代性的概念内涵。这两个概在过去几十年来主宰了教育和慈善的规划，并且从传统对于科、医药、工程的重视转移到了财金、管理、等私部门活动。社会科学的地位也体现了该区域教制度的缺点，特别是高等教育。私人高等教育已经彰显了教育制度的不平等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化。同时，学术界的声音在公共政策的辩论中越来越小，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社会科学家的问题和现实世界无关，而社会科学家则批评政治忽略科学。

教育政策、发展的概念、对于公共领域的限制等，这些事实仍然和概地去的社会科学社群的积弱不振、对于自主知识领域的建立的无能为力有着影响。这里有三个基础的面向：对于累积经验为基础的、对抗霸权和意识形态的政治纲领的能力、对于影响政策的能力，以及去保护和推动专业兴趣的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的制度弱点，阿拉伯社会科学家无法完全参与地区或是全球的知识网络。阿拉伯社会科学社群仍然是在国际主要的网络之外的，并且无法做出贡献。

尽管从一开始营运都不是太容易，这些都是

>>

ACSS 想要去处理的议题。研究环境也因为和持续升高的的区域冲突而变得紧张，像是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家。例如在埃及，对于研究的监视和吓阻是一直增加的。这影响了 ACSS 的区域影响力，也限制了其举办活动的能力。此外，某些国家的 ACSS 的受补助者被迫要改变研究计划，并且减少研究的活动内容。最后，因为新的签证要求和旅行限制，交通变得越来越来越困难。

但是尽管有这些或是因为这些困难的存在，ACSS 重要的是可以继续提供支持和机会该地去的研究者，并且去建立更紧密的网络。我们很高兴趣注意到受奖者的韧性，以及其及决心去追求研究的目标。计划申请者的数量和参与者尚未减少，而对于 ACSS 的兴趣则持续增加之中。黎巴嫩仍然是一个帮助区域整合和提供学术自由的国家。ACSS 也对于这个变化的环境和其活动与计划的创造性有着很高的弹性与注意，并且也对于基础的目的和价值持续支持。我们期待区域和国际的合作、交流，并且希望成为阿拉伯社会科学的再兴媒介。■

來信寄給 Seteney Shami
<shami@theacss.org>

> 阿拉伯社会科学

阿拉伯之春的前后

Idriss Jebari, American University in Beirut, 黎巴嫩

阿拉伯之春对于阿拉伯社会科学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关于阿拉伯社会科学的第一篇文章中，社会学教授 Mohammed Bamyeh 处理了阿拉伯社会科学现今所面临难题：一个在历史上就像对薄弱的学科生长在一个丰富、动荡、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面。阿拉伯之春至今五年了，已经有足够的距离去批判地质问社会科学如何解释了这个转型。而该文又如何的描述了阿拉伯社会科学面对的挑战呢？年轻的阿拉伯社会科学家又可从这之中学习到什么样的公共议题？

> 阿拉伯社会科学的挑战

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了阿拉伯的知识生

>>

产的质量不足。Bamyeh 的报告中清楚的避免重复那些常见的解释，像是全球整合或是政治稳定性的缺乏，凡而是聚焦在相关的制度上面。他认为阿拉伯的社会科学家虽然没有孤立，但是在社交能力上却很弱，并且失去与那些形成的历史特质失去了连结。总之，阿拉伯的社会科学并不一定是去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能见度，但是却是做好研究和影响政策。而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围绕在该学科和社会的疏远，以及那些质疑科学价值的市场力量。

这个制度观点把阿拉伯的社会科学定位在介于普世主义和地方主义之间。Bamyeh 似乎倾向前者，但是也承认这些学科已经和西方的社会科学互动频仍，很难切割开来。他去看过去这段期间的文本的主题分布。此外，他也避开了“地方特殊主义”的议题以及对于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因为这些问题给阿拉伯社会科学带来了许多难题（例如，在 Gellner 的宗派架构以及那些偏好布迪厄的阶级中心的社会学）。 然而，这些选择继续地形塑了该地去的社会科学研究，阿拉伯社会科学家也因为外国的文章发表也增加的能见度，也不论在主题或方法上都影响了研究的取向。

这篇文章里 Bamyeh 的取径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层次上的“分析单位”的议题：当我们把阿拉伯地区当作一个整体，或是研究一个抽象的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为了得到更普遍性的结论，于是在结论的部份才处理了国家和地方的脉络，这么做是有意义的吗？作者援引了该地区 80 年代社会科学的“伊斯兰化”，然后在讨论家庭和犯罪学兴起的现象之前，转而细致地讨论沙特阿拉伯的个案。沙特阿拉伯在这现象是很明显的，但是却没有讨论其他重要的现象，像是社会冲突或是移工等也相当重要的问题。同样地，Bamyeh 也讨论了 Mokhtar El-Harrach 的对于阿拉伯期刊的背景研究，包括了跨国的比较，试图去理解阿拉伯如何文化期刊如何发挥功能，发现理论研究占了 68% 的内容。然而，他也指出了那些期刊的对话对象还是只有在地方层次，没有链接到更大的阿拉伯世界，没有提供对于如何造成不同结果的足够解释。类似的还有“研究密度”这个词（研究中心总数除以国家的人口数）被用来分类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但是“普遍供给养分给研究中心的氛围”则是用来解释对于“社会科学”的兴趣如何在不同的脉络而有差异。作者承认一个更大的图像是被其他的机制、诱因、施加在学术界的压力等所形塑的，但是这却没有进一步细致的讨论。

作者也承认该报告是对于当前状况的“调查”，是为了日后其他形式的发表用的。而后来的发表文章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并且涵盖除了 2010-2015 年之外的期间，并提供参考文献。虽然这篇报告有所限制，但是还是成功地描述了该场域和形塑之的力量。

> 社会科学和阿拉伯转型

Bamyeh 的社会科学制度结构的研究是该报告的最有力的贡献，其提出了关于学术从业人员在公共领域所面临严峻挑战的问题。

他的呈现了阿拉伯大专院校作为社会科学“自然的家”(48% 的大学有社会科学系所或学位）。平衡了科系分布是被至少有 436 个研究中心、专业社群以及 217 的学术期刊的网络所支撑的。其资料也彰显了一个有趣的趋势：阿拉伯社会科学家的语言越来越跟国际接轨，然后阿尔及立亚和埃及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占了多数。

这些数据强调了另外的现实：阿拉伯社会科学家面临着在知识生产累积、传布、以及推动社会变革之间的紧张关系。Bamyeh 讨论了“非传统行动者”的重要性，如公民社会。还有也利用了其他论文去强调 NGO 如何“不仅使用也生产了社会科学”。相似地，那些熟悉阿拉伯脉络的人也知道泛阿拉伯的机构像是贝鲁特的阿拉伯团结研究中心或是多哈的阿拉伯研究与政策中心，其可见度都超越了大学院校。这些制度转变给了关于这种转变对于知识生产之影响之辩论带来了很大的重要性。若是这样，如作者建议的，这些中心若是无法取代学术研究机构，那是不是意味着“传统”社会科学其实是有危机的呢？

Bamyeh 对于公民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角色的评语显示了他承认它们实际上的贡献，历史数据的建立，以及认识上的考虑，但是也很显然偏好“学术团体”而非“半学术团体”。作者认为那些在方法上严谨、生产进步知识、并且在学术上有地位的“学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若要达成其目标，总是要保持某个距离，而不是掉进各种抗争之中和再生产政治立场，说别人已经说过得

>>

东西。”同样地，他在对于期刊和报纸的研究之中，其决定什么才算得上是社会科学的方式包括了“深度”：“复杂度”或是“专业内容”。Bamyeh 显然对于方法论选择的证成比较在意，并且比较是学术研究而非政策导向的报告。

这些偏好说明了作者对于革命性认识论转变的想法和对于社会科学在阿拉伯世界的想象，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这种历史转变之后。作者其实保持着古典定义下的“革命”，并且特别其对于阿拉伯之春对于新生代阿拉伯社会科学的影响之考虑不够周详，因为阿拉伯革命的世代的社会镶嵌形塑了他们的参与和对于改变的渴望。

Bamyeh 的理想的一种客观、中立、超然的阿拉伯社会科学家想象也不代表了过去的典范。阿拉伯之春作为一种认识论革命可以带来的是一种可以从把现实当作一个需要保持距离观察的东西的这样一种想法拉到另外一个有机的连结上，然后把期待带进到研究之中，而不是试着要用严谨却不适合的框架去规范社会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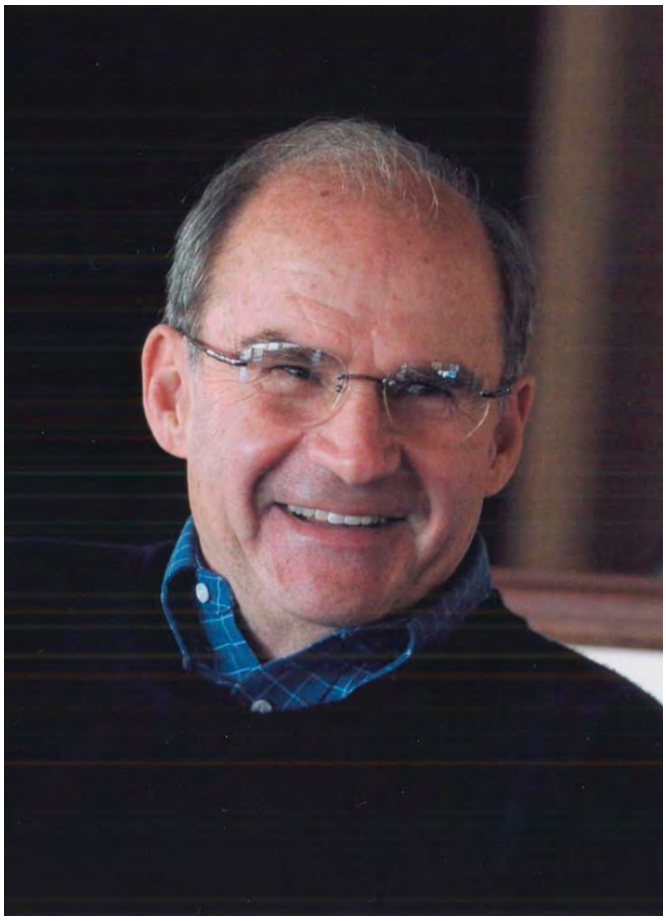
> 结论

Mohammed Bamyeh 的到达点和我不同。Bamyeh 是去调查一个大的场域，并且看阿拉伯之春的前后发展，但只提出了该运动的成长和挑战，却没有提出建议。他的结论是说，在阿拉伯社会科学可以“宣称已经带入了社会科学的精神并且用多元的方法做研究”之前，必须历经一场大变革。这个目标并非直线可达成的，也显示了阿拉伯社会科学还没有想出自己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定位为何。

与其聚焦在社会科学的“现在”，或许我们应该问更动态的关于“持续”、“韧性”、“一致性”、“实质内容”。从“阿拉伯之春世代”的观点，而非主题、制度环境、方法的角度来说，现在是让阿拉伯社会科学变得不一样的关键时机，也是寻找任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设计更科学的研究议程。或许这个告会开启更多的对话机会。■

來信寄給 Idriss Jebari <idrissjebari@gmail.com>

> George Ritzer
论麦当劳化和生产型消费



George Ritzer.

George Ritzer是全球化理论中相当重要的学者。他也是美国Maryland大学的杰出社会学教授。Labinot Kunushevci是科索沃的Prishtina大学的硕士生，访问了Ritzer教授。这篇文章是访谈的节录。

LK：Ritzer 教授，你的“麦当劳化”概念相当有名。你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吗？或只是一种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

GR：我从 1990 年开始以来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的处理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社会的麦当劳化》(1993) 把“麦当劳化”当作这样一股力量，其原则（效率、可预测性、计算性、控制、理性系统的非理性）从美国输出到了世界其它地方。这些原则以麦当劳或是其他美国企业的形式全球化，并且也到了其他的组织（教育和宗教）。

在我的书《Expressing America: A Critique of the Global Credit Card Society》(1995) 中，我处理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与经济帝国主义：信用卡。这是一种美国的发明并扩散到全球世界各地。信用卡让美国式的债务和消费文化全球化了，这也是我在《Enchanting a Disenchanted World: Revolutionizing the Means of Consumption》(1997) 一书中直接处理的议题。消费工具的概念是从马克思生产工具的概念而来，而美国的主要消费场域是连锁的快餐店、购物广场、主题公园（如迪斯尼）、拉斯韦加斯式赌场、邮轮等。这些都扩散到世界各地并且成为观光客的目的。这些大型且魔幻式，甚至宗教般的场所我称之为“消费教堂”。一旦全球化，这些教堂成为了美国高度的消费社会的扩散媒介。

至少对我来说，我的书《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是这个主题中最重要的一本。我定义“nothing”为一种社会形式，一种没有特殊内容的、被中央控制的形式。麦当劳和其产品（如大麦克汉堡）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nothing) 被全球化。这种全球的“nothingness”已经把许多在地的“某些东西”(something) 给边缘化了（在地控制的，并且独特的）。因此，我们的全球化基本上是没什么东西的 (nothing)！

>>

LK：你把全球消费的概念延伸到大学，你对于现代大学的看法是？

GR：我通常把现代大学称为麦当劳大学。意思是，教育透过强调效率、可预测性、计算性、控制，已经变得麦当劳化了。这个机制帮助设立了大众的教育系统，但是理性系统的非理性让质量降低了。这和快餐店的食物质量一样，你可以买到大麦克，而非好麦克。也让大学继续维持现状，麦当劳大学越来越独占和传播知识知识生产。我最近的研究则是放在生产消费(prosumption)，这是“生产”和“消费”的结合。学生总是生产消费知识。学生不只是被动的消费者，也是主动的生产者，生产那些蒸发和流出的知识。

LK：你是个多产的学者，想必有很多有趣的计划正在进行，可以简短让我们知道一下吗？

GR：我最近的研究放在生产消费上(prosumption)。我们总是生产型消费者，从来不只是生产者或是消费者那么简单而已（这是一种必须遗弃的现代二元对立）。顺便一题是，生产消费者的场域是因特网，并在部落格或是脸书上进行生产消费。我们也越来越多地在消费教堂中进行生产消费，我们作为“消费者”做了越来越多的“工作”，那些工作之前是由雇员进行的（想想我们在快餐餐厅、购物广场、IKEA 等做的事情）。我最近也开始去论证我们都活在一个“生产消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宁愿付钱给生产消费者，而非工人。Uber 就是最好的例子，出租车司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开 Uber 的生产消费者。当我们从 Amazon 买书时，我们不只消费，也在生产，于是工人不见了。结果就是新的资本家(Mark Zuckerberg, Jeff Bezos)成为了亿万富翁，用生产消费者取代了传统的工人。生产消费者是无偿的，而且还不是员工，所以可以省下许多钱，还不用帮他们买保险。新的科技（像是机器人）将会让企业依赖生产消费者（或是他们自己作为“生产消费机器”去生产消费）。

來信寄給 George Ritzer <gritzer@umd.edu> 和 Labinot Kunushevci <labinotkunushevci@gmail.com>

> 与全球社会学
超过40年的关系

Edward A. Tiryakian, Duke University, 美国, 社会学历史委员会(RC08), 社会学理论委员会(RC16), 和宗教社会学委员会(RC22)委员

ISA于1974年的世界大会，于加拿大的多倫多，这是Edward Tiryakian参加的第一次大会。

我很荣幸被邀请来分享我和 ISA 的过往经验。不过要说在前头的是，我的回忆未必完整和精确。读者毫无疑问的可以看 Jennifer Platt 的文章并且受惠：A Brief History of the ISA, 1948-1997。

国际的场域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并且和社会学理论一样是我非常有兴趣的部份。我也是美国社会学会 (ASA) 的成员，且任职于其国际合作委员会，且成为该委员会主席，而前任主席 Reuben Hill 则是 ISA 的会长 (1970-74)。Reuben 希望美国社会学可以走出美国，他也邀请我加入了 ISA。我第一次接触是在 1974 年，Reuben 那时邀请了苏联的社会学家去参加 ISA 的第八届多倫多世界大会。而那之后，各国代表则参加了在蒙特婁的 ASA 年会。

在者两个场合中，国际合作委员会提供了海外学者的联系桥梁。我特别记得和俄国社会学家的互动，冷战气氛很快消失，因为大会的气氛非常愉悦。对于 Reuben Hill 和 ASA 的会长 Peter Blau 来说，这联合的会议证明了社会学外交的成功。

在这之后，我申请了 ISA 的终身会员，这是我做过最好的投资了。在 Uppsala 的第九届大会上，我还记得大会非常成功，而且瑞典的开销很贵，但也很现代。或许 Uppsala （不像 Toronto 或是 Stockholm) 是个大学城而非大都市，所以有很多机会可以和各国的学者认识，这也是国际会议吸引人的地方。

在 Uppsala 之后，第十届大会在 Mexico City (1982) 举办，有许多的西班牙语场次，那是 ISA 的第三官方语言。会场中也一直被 Alain Touraine 提醒要感谢拉美的学者。Tourain 一直是世界社会学的支持者，无论在国际会议上或是法国的研讨会上都是如此。

>>

该次大会我们却经历了财务上的混乱。墨西哥的财政部长宣布该国无法偿付债务，因此产生了金融危机。ISA 的与会者要兑换美元，但是汇率却让人搞不清楚。汇率一夜之间就变了，但是分行都不知道墨西哥央行的汇率。有些使用信用卡的与会者发现可以从标准房升级到贵宾房，因为披索贬值很大，美元升值很多。也不是所有人都得利，很多人赶快就离开墨西哥了。

这是唯一一个我记得在这个危机事件期间参加的 ISA 会议。在 Madrid 的大会很好，除了没有空调和酷热之外。在 Bielefeld 的 13 届的大会 (1994) Richard Grathoff 邀请了波兰和其他东欧的社会学家，他们在苏联的压制下仍然相当有活力。

我和 Grathoff 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把质化、诠释取径的社会学放在社会学理论化的核心位置，而我也很高兴他要我继续在《International Sociology》期刊上担任编辑委员（他在 1991-1996 担任主编）。我加入的时候，Martin Albrow 是第一任主编 (1984-1990)，而我很荣幸成为作者和审查者，因为这是一个推动比较全球社会学的刊物。

虽然说要参加全部的 ISA 大会是很难的（因为退休后的旅行费和对 ASA 的职责，ASA 的会议和 ISA 都在同个时间），但是我还是很荣幸地参加了最近的大会於蒙特婁 (1998)，布里斯本 (2002)，哥登堡 (2010)，横濱 (2014)，和在維也納的世界论坛 (2016)。我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相见（但是越来越少了），交新的朋友，并且激荡新的社会学点子。这些对我的吸引都还是和我第一次加入 ISA 的时候一样，而且我确信也一定要参加 2018 年在多倫多的 19 届世界大会。

來信寄給 Edward Tiryakian <durkhm@soc.duke.edu>

> 介绍日本编辑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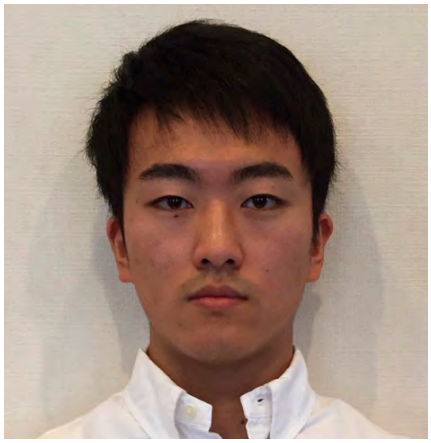
我们很荣幸可以向读者们介绍日本的编辑团队。这个团队从 2014 年的 12 月开始负责日文版编辑，大学生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他们是国立水产大学的学生，该大学于 1941 成立，是一所由农鱼森林部认可的公立大学。以下介绍这个团队。

Satomi Yamamoto 是英文与社会学副教授，隶属于渔类分布与管理系。她从日本女子大学的英文系获得硕士学位，University of Chicago 获得社会科学硕士，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获得社会学博士。她的研究聚焦在美国入侵鱼类的社会学分析。

Fuma Sekiguchi 是食品科学和科技系的四年级大学生。他在山口县出生，于千叶县长大。他目前休学前往美国的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和 Chico 和 Butte College 进修。其座右铭是失败为成功之母。他喜欢游泳，棒球，读英文。

>>

Yutaro Shimokawa 是食品科学和科技系的二年级生。他正在研习海洋产品的食物组成、处理技术、有效使用。他加入团队是因为想加强英文的阅读能力，目标是去阅读食品科学的英文学术文章。



Masaki Yokota 是鱼类分布和管理系的四年级生。他在 2014 和 2015 年时在英国念英文，获得 IELTS 的 6.5 分。他喜欢打网球和看足球。他最喜欢的是 London 的 Chelsea Football Club 球队。梦想是环游世界。

Takashi Kitahara 是鱼类分布和管理系的四年级生。他将会于 2017 年 4 月就读食品科学和资源管理研究所。他的大学论文研究日本水产养殖的企业。他会加入翻译团队是因为喜欢学习主修科目之外的东西。

Yuki Nakano 是应用海洋生物学系的二年级大学生。她决定念国立水产大学是因为从小喜欢动物和鱼类。还没有决定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她希望可以找到与其主修相关的工作。她有时候觉得翻译英文到日文相当有挑战性，但是很高兴可以加入团队，因为可以帮助增进英文和日文。